

后 记



钟少华
(摄于日本)

我在小的时候，常听母亲讲日本的种种情况。在抗战逃难中，我也看到了日本军用飞机在我头顶上示威的情景。后来我偶然掉进社会科学的魔圈，对于我们中国的邻居日本，真是有极为复杂的猜测心情。自己看不清楚，说不清楚；听别人说就更不清楚。中国古代有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，讲的是为儿子选择近邻。中日做邻居有史几千年，迁是迁不动的，退而求其次，能不能够相互做好邻居

呢？我是一直琢磨这个问题。我想，首先是相互了解，再就是进行交流，求同也求异，才能够讲做好邻居吧。当然，道理好讲，实际如何呢？按照姚宝猷教授在40年代的研究，中日邻居关系自唐朝有良好的开端，元、明朝有恶劣的发展以来，700年间的好关系和坏关系，都足够各自写成长长的一本账，整理都整理不完，看都看不完，更难说做什么判断了。如果按传统的一分为二的办法，我是切不开这本恩怨帐的；如果说：“好中有坏，坏中有好”，我觉得不如不说。因此我想，恐怕问题出在我们的认识方法上面。

虽然人人都说真理是清楚的，我也唯恐落后，故把自己也算进坚持真理的队伍里。当10年前，汪向荣先生、谭汝谦博士把我硬拉进来研究中日关系时，我实在是不知深浅，无奈下水的。很突然，竹内实教授邀请我在1993年去日本做一个客座研究。一年时光，我就浸泡在日本文化中，自然我可以吹牛说有“大大的收获”，但我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。只是在研究方法上，我倒是觉得应该换个角度和手段。一般来说，人文研究方法分两大类：规范性方法和描述性方法。中国多数学人及汉民族传统，历来弘扬规范性方法，被称作“喜鹊文化”是颇为贴切的。但是我们民族吃这种思维方法的苦头也太多了，特别在我们面临现代化的21世纪时候，仅用简单的相对性概念，判断或好或坏，是不足以研究如此复杂的重大问题的。所以，我鼓吹描述性方法在现实中的运用。描述性方法丝毫不神秘，它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，对主观思维和客观事物，先不要忙做判断，而是虚心地描写研究对象所有特征（绝不仅是部分对自己有利的特征）。在能够描述清楚之后，自己和别人都可以共同认识之后，才有办法考虑哪一个特征是正常，哪一个是不可能的毛病，而哪一个又是非除去不可的病态，等等。建立这样的全民族描述

性的认识基础，何患什么香风、臭风侵略我们头脑？日本人在描述性研究方面，放得开手，有丰富的成功经验。

话似乎讲得远了，但这就是我要访问这些老留日者和出版这本书的原因。我在日本接触不少中国年轻留日学生，也接触一些日本人，我深感他们之间的喜怒哀乐，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现代形态，但能否说得清楚呢？我回来向老留日者们打听，他们一开讲，我似乎发现了一个宝库。于是，我拿出了我干过的老本行——口述史学，我打开了录音机，收录了他们沉静但又充满激情的语言，再用近一年的时间整理成文字稿。

这次我访问的老留日者共18人，整理成文字的共14人，其中年龄最高者为93岁，录音最长的为8盒带，28000字。读者能够从他们饱经沧桑的面容上想象，他们曾经为中日关系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。可惜读者没有能够同我一起聆听他们的描述和呼声，这既是过去时代动荡的反响，又是今天理智的教导。诗人说过：文字要比声音苍白得多。哪位读者想听的话，录音带目前是在我手中保存，可以同我联系。至于内容的价值，我可以肯定是同档案等值，是第一手资料。这是口述史学规定好了的，读者尽可放心使用。读者很容易就会发现，内容同目前大陆赚钱的“报告文学”很不同，因为里面没有虚构的情节。那么会不会有差错？有的，正像文字档案也差错很多是一样的。尽管每一篇口述稿都是经过口述者本人核对过的，也还是不免历史的时差在做怪，以及我能力的不足而造成的差错。反正在我的观念中，“口述史学”和“口述文学”是两个不同的范畴，不容搅浑。

关于口述史学的主题访问方法，那是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，与西方传统的口述史学方法有所不同，即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讲从小到老的经历，而是围绕一个主题，请一些相关的受

访者来谈。本书正是这样的成品，是主持人和受访人合作的成品。近年来，据一些书籍上自称是口述历史，我也不想一本本去查对。我这里只想提出两个作为判断“口述历史”的标准：一是凡称口述历史书者，应该有录音带，可以公开利用；二是编口述史书者，应该证明自己的史学能力。这两条欢迎大家使用。回想我在10几年前，开始搞口述历史，那是茅以升院士叫我搞的，访问中出的洋相可多了。到1987年，我已经访问了上百位老人，才从一位美国博士那里得知，我搞的工作居然有个专用词叫“口述史学”，在国际上是一种专门的历史学科，有各种工作原则和手段。

相比之下，日本人在用口述史方法来收集、研究中日关系方面，那是要早得多，丰富得多。本书中就提到实藤惠秀教授的工作，他在战争中，为了他研究多年的中国留日学生史，依然四处访问老留学生。虽然没有录音机，还是记下许多珍贵口述史料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，我自己有时感觉就像是在继续实藤惠秀的事业罢了。仅以此遥敬实藤博士在天之灵，及为中日间和睦相处、共同发展而付出心血的人们。

我能够编著成这部书，首先是和这10几位老人的愉快合作，我们促膝对谈，一时娓娓道来，一时又会心大笑，当然也有争论。没有他们如长辈般的教导，我是做不成功的。仅在此对他们所代表的真诚的老一代中国人，致以深深的敬意；其次，我这次用的录音机是台湾学者李貌华女士所赠，照相机是香港朋友吴达先生所赠，闪光灯是日本高野山山岸荣岳住职所赠，工作经费是我童年朋友张小云教授所赠。他们都鼓励我能够为中国口述史学出一点力，在此也表示谢意；我还荣幸地得到日本竹内实教授写的序言，他一生钻研中国和日本文化，他的关照，证明了他对现代中日交流的深一层的注视和寄托。按照中日礼

节，我都应该向竹内实教授深深鞠躬致谢；最后还要说明一下，我在这10个月的时间中完成此书稿，大部分用的是零碎休息时间，交错进行，没有影响我写其它论文和一部理论书稿。当然这就给家庭里添了许多麻烦，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1995年8月记于北京